

日久他鄉是故鄉？

莊紹岳

清華大學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

中國之於我有了意義，是在1996年我父親開始固定往返上海以後。那時我對於他是所謂的「台商」或「台幹」都分不明白。父母對我的教育方針與未來發展也一直很明確：台灣仍是我未來成長的環境，既沒有什麼「家業」需要我去繼承，也不需要我去考慮在中國生活能否適應。所以對於台商第二代，讓我直覺的感到好奇的是：成為別人眼中的「小老闆」、「董事長特助」，他們的心路歷程是什麼？是否經歷過許多轉折與矛盾、甚至與家庭的衝突後，不得不然的妥協結果？

「為什麼現在會在中國？」這個問題，第二代們其實沒有太多的思索，隨著家庭來、

隨著父母的安排接班而進入公司熟悉業務，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第二代們幾乎都有在中、台之外的第三國家（且大部份為美、澳）的求學經歷，他們也有過可以選擇在別的地方生活的機會。只是當家庭不只是家庭，而同時也是一個企業時，似乎較一般的家庭產生了更大的制約作用。這其中不全然是家庭壓力下的無奈，台商青年會的陳會長就直言：「與其靠著打工、賺錢，不如好好運用一下先天的優勢。」這確實是所有台商第二代幸運的地方：家庭的先一步開墾拓荒，讓他們有著比一般年輕人更高的立足點、更領先的起跑點，也許他們可以選擇的人生並不多，但如果他們並不想



與台商及第二代合影

要那麼多選擇呢？這不禁讓我陷入初接觸社會學時，與我原本熟悉的經濟學先決假設相衝突下的困惑：每個人看似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可以自由的選擇使自己效用極大化的行動，但在有限理性下我們所「得以」認知到的可選擇方案，是受到多少社會建構下的「已被篩選過」的自由選擇？又或當某些個體根本不想要選擇的權利而只希望被安排有歸屬安穩的成為這社會上的一點座標時，我們該用怎樣的標準去詮釋他們的人生？

訪談中的笑聲不斷，我們從第二代的關係網絡談到了年輕人最感興趣的男女交往問題，令我們吃驚的是：在東莞台商青年會一百多位成員，男女比六比四，年齡限制在21~35歲，而且時間較一般台幹更為彈性。然而這些青年會成員們，竟然幾乎所有人皆為單身！「台商青年會難道沒有聯誼活動嗎？」，困惑的我們提出了直接的問題，而這卻也是讓陳會長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個現象，「我們明明就有辦啊……到目前有促成一對了啦！」。如此低的比例，也許來自第二代繁忙的工作與巨大的壓力，使得青年會的成員彼此雖有聯絡管道，卻難以投入大量心力維繫私人關係。

這使我們產生了另一個感興趣的問題：「不會想要和中國大陸當地的年輕人交往嗎？」、「有工作以外的（中國當地）朋友嗎？」，面對這兩個問題，在座的第二代們無論男女，都露出了頗為尷尬的淺笑，笑容底下包裝的是對建立這層關係打從心底的不以為然。「不能溝通，是最大的關鍵！你根本就不知道要跟他講什麼。」文化上的巨大隔閡，使得第二代接觸到的當地的中國人，除了商場往來對象或自己手底下的員工外，幾無具備第二層意義。海峽兩岸失落了過半世紀的集體記憶、社經成長上的落差，無可避免的造成了第二代在來中國工作時，生活圈較在台灣工作的同年齡青年們狹窄；而他們又比隻身前來的台

幹們幸運些，至少他們的家人就在身邊。

訪談的結尾問到他們對未來的規劃，大部份的第二代都已經對於自己往後大半的人生要在中國打拼有了心理準備，他們不覺得這特別好或特別壞，只淡淡的說哪裡有生意就去哪裡賺。我卻從他們的言語神情裡，看到了深刻的孤獨，與被認同的渴望。不若他們的父母是認同著台灣，卻不得不離開台灣，對這些第二代而言，他們有的很小就跟隨父母過來，大了卻又被送去美國唸書，又或是到大學才回台灣讀書，一畢業服完兵役又被喚至對岸去繼承衣鉢。他們沒有徹底不認同哪一國，卻也不知該深刻認同哪一國。美國、中國、台灣，都有他們成長的記憶，卻也都只擁有片段的記憶。他們的往後的日子要在中國度過，周遭卻又大多是文化認同困難的「大陸同胞」；從盛重接待我們的熱情裡，我想有更多的是對於「他鄉遇故知」的珍惜。

即使我們不是故知，只是初遇；但那熟悉的口音與無礙的溝通，正是第二代們欲建立日常的人際關係的基本要求，但卻遍尋不得。